

中国的现代性与人文学术丛书

全球化与人文学术 的发展

高瑞泉 颜海平 主编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全球化与人文学术 的发展



高瑞泉 颜海平 主编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全球化与人文学术的发展 / 高瑞泉、颜海平主编. —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3

ISBN 7-5325-4267-X

I. 全... II. ①高... ②颜... III. 人文科学—研究 IV. C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37049 号

中国的现代性与人文学术丛书

全球化与人文学术的发展

高瑞泉 颜海平 主编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5.625 插页 2 字数 131,000

2006 年 3 月第 1 版 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250

ISBN 7-5325-4267-X

B · 526 定价: 18.00 元

如发生质量问题, 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序“中国的现代性与人文学术”丛书

高瑞泉

现代性研究在当今中国可谓方兴未艾,尽管“现代性”本身已经绝对算不上新鲜的话题。坊间正流行着各种各样翻译介绍西方学者的现代性批评论著,从哈贝马斯到查尔斯·泰勒,从福柯到夏尔·波德莱尔,说明“现代性研究”本身作为对现代现象的总体性反思,如何引起了中国知识界的关注和热情。同时也展示了现代之后的世界,精神之芜杂和意向之分歧。不过,我们组织编纂出版这一套“中国的现代性与人文学术”丛刊,并非只是泛泛地参与到对时代核心问题的讨论之中,而是自觉地意识到现代性研究中两个相互勾连的环节:第一,“中国的现代性”;第二,现代性视域中的人文学术。它们构成了本丛书所措意的核心对象,希望以此为中来贡献我们对现代性问题的研究和思考。

“中国的现代性”的概念,以多元现代性或多重现代性之存在为前提。与早期的现代性研究者的观点不同,今天越来越多的人承认单一性不是现代性的正确摹写。哈贝马斯说黑格尔是第一位意识到现代性问题的哲学家。不过 18 世纪的黑格尔不仅是一位

欧洲中心论者,而且是德国中心论者,中国则完全在他的总体历史之外。本世纪第一年,哈贝马斯应邀访问华东师范大学,在午宴上盛赞中国,说他站在东方明珠顶楼眺望上海,感到自己正在“世界的中心”(the center of the world)。让人领略这位理论大师在社交场上的机敏与魅力,也让我们这些东道主的虚荣心得到无伤大雅的满足。当然“中国的现代性”之被重视,并不仅仅因为中国经济起飞或“中国崛起”成为一个流行的话题,还因为我们对中国经验具有的文化反省和文化自觉。经济现代化的历程,不但使得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传统有了更合乎辩证法的理解,而且真正面对了哈贝马斯所说的那个历史节点:只有当经济合理性和官僚合理性(即认知—工具合理性)明显占据统治地位时,现代社会的病症才会暴露出来。

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与世界日益被普遍的市场秩序殖民化相比,使用文化概念来重塑本土现代性的努力是无足轻重的。譬如詹姆逊就认为,人们谈论拉丁美洲的现代性、印度的现代性、非洲的现代性和儒家的现代性等的时候,会忽略了现代性的资本主义全球化本质。当讨论到全球化中的民族文化的时候,许多人会实际上承认存在着多种多样的现代性:詹姆逊就几乎同意约翰·格雷(John Gray)的说法,即世界经济的增长,并不一定引起普遍的文明,如像斯密和马克思所认为的那样。相反,它允许种种本土资本主义的发展,它不同于理想的自由市场经济,彼此之间也互不相同。它造就的政权通过恢复自己的文化传统来获得现代性,而不是模仿西方国家。因此有多种不同的现代性,就像在现代化过程有多种失败的方式一样。

与单一现代性理论所依靠的历史单线进化论预设相反的是,二次大战以后全球化的进程同时出现了另一种状况,渐渐实现现

代化的非西方国家或社会,大多拒绝了与现代西方完全同质化的道路。一方面市场经济、民主化、个人主义、家庭变化、都市化、工业化、现代教育、大众传媒,到处都看到西方化的影子。另一方面,正如艾森斯塔德所说的那样:这些东西得到的定义和组织方式,以及由此产生的建制类型和意识形态并不相同,所以多重现代性是对这样的客观情势的一种肯定性描写;诸多文化规划不断得到建构和重构。从全球看,在现代和现代化的社会里,在现代化的各个阶段甚至可以看到更加多样的具体的制度类型。作为一个东方大国,近代中国尽管饱受帝国主义的欺凌,但并未真正沦为殖民地国家;她的悠久而富有生命力的传统在与殖民主义对抗的过程中,成为民族意识的强化剂,它曾经与意识形态的目标相结合,或者直接诉诸文化创新的力量,来改写现代性的社会设计。更进一步说,现代性研究本质上是现代社会及其发展前景内在问题的知识化过程,是人类对自身存在的基本和永恒的若干问题在当下条件中的自觉,是人类对未来社会的理性规划的努力的一部分。因此,中国的现代性研究,应当在它的历史向度中表达当代人的批评精神和理论创造。已经有不少学者意识到深入研究“中国的现代性”之迫切与重要,并且已经有若干重要著作问世;但是迄今为止,学术界对“中国的现代性”的专门研究,总体上远不及对西方现代性理论的介绍和翻译之规模。因此,将中国的现代性作为本丛书的研究对象,自然表示了一种提倡和一份努力。

把中国的现代性研究与人文学术发展联系起来,是本丛书的又一重目标。众所周知,现今中国的人文学术,从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之学,经过 20 世纪的转变,尤其是取法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科学,由此纳入现代学院体制,成为现代学术形态的知识系统。如果我们同意现代性是特定社会现实和特定世界观的结合的

话,那么人文学术多多少少就是现代性的一部分,是现代性的自我确认,至少表达了现代性自我确认的努力。我们知道,现代人文学科的形成与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传统密切联系,现在汉语称做“人文学”,英文翻译为 the Humanities 的那些科目,在 15 世纪意大利指的是语法、修辞、历史、文学、道德哲学这一套科目,它们当然也包括了要学这些科目就必须具备的拉丁文和希腊文知识。虽然直到 19 世纪初才出现“人文主义”一词,但是后来人们普遍接受了像布克哈特那样的历史学家的观点,将人文主义用于他们认为与古典学问的复活有关的新态度和新信念上,即将现代人文学科中的新态度和新信念称做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显而易见,西方人文主义,不管其普遍性如何,都不是价值中立的知识。事实上,数百年来,以欧洲现代性为中心世俗化人文主义无论在知识上还是在道德上都发生了复杂的变动。

另一方面,中国固有的人文学术当然有她悠久而伟大的传统,但是以古代“四部”之学为内容的传统学术,早就经历了 20 世纪的巨大变革,虽然并未完全变成绝学,毕竟已转变为现代学术的知识形态。且不说,当代中国精神的主流已经是这两股变动之流的不同程度的融合,即使是人文教育中引人注意的中国经典阅读的新实验,也实际上总是有意无意地在对古代经典做现代诠释。这种诠释或者是强调中国的人文传统具有民族特点的人文主义原则,或者是用一种普遍的人文主义来解释中国经典。无论是关于重写学术史的呼声,还是若干年前开始的对 20 世纪中国学术的回顾,其实都体现了对人文学术的反省意识和现代性语境中的人文创造。它的最近走向似乎与中国的现代性研究之旨趣有某种内在的契合。

随着全球化的浪潮,现代性的自我矛盾、自我分裂,在人文学

术的处境变化中获得充分的表露。西方人文主义并未能幸运到能逃避其内在矛盾的发展,因而它自身就是分裂的。文艺复兴运动的主题是“人”,它转变成现代性的哲学表达就是主体性,但是后现代主义今天不但宣称哲学根本上要放弃追求那个大写的“真理”,主体性消失了,甚至说“人已死了”。与此相伴的是所谓“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自然科学特别是技术与市场机制的扩展,迅速地改塑着人文学科的空间,即使是学院体制内部也不能幸免。人文学术今天的悖论是:一方面人类因为迫切需要生产一种创新文化和提供作为选择的独特生活方式而特别需要非凡的知识上的努力;另一方面,这种知识生产不仅受制于内部的观念冲突,而且受制于外部的生存条件。如何破解这个悖论,实在是现代性研究的关键之一。

毫无疑问,“中国的现代性与人文学术”提示了巨大的研究空间,本丛书以此为目标,并不表示怀抱着短时间内就对它展开全面研究的雄心,而只是在提倡以一种持续、局部的具体问题之研究,尝试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地逼近这个目标。对于中国的人文学者而言,无论是中国的现代性,还是现代性语境中的人文学术,都是道地的“为己之学”。所以我们不但相信,假以来日,这项研究一定可以积微为著,有助于我们整体理解现代性而且相信即使是局部的,以个案为中心的工作,也自有其内在的价值。

序一

高瑞泉

—

可以有把握地说,如果中国学者要撰写类似英国学者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那样的著作,挑选一批当代中国人常用的词汇,分析其意义形成的过程,用词源学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文化批评和社会价值,有三个概念一定不会忽略:现代化、全球化、现代性。这三个词,在当代中国(尤其是学术界乃至读书界)使用频率之高,是有目共睹的。它们在威廉斯那里并没有占据“关键词”的地位,Modernization(现代化)和 Modernity(现代性)只是在 Modern(现代、现代的)中附带地提到,而全球化(Globalization)完全没有提及^①。这使我们在不满意之余,可

① 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著,刘建基译:《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三联书店,2005年。

以清楚地意识到最近几十年中,知识的焦点是如何在发生迅速的转移。

事实上,随着中国的崛起,现代化、全球化和现代性三个词,虽然属于同一系列,但是在中国流行的时间表上还是有次序可寻的。“现代化”出现最早,但大致上,在它出现几十年以后,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才成为一个妇孺皆知的词语,这是与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人追求现代化的那种无与伦比的迫切和热情相应的。人们通常说的“改革开放”,似乎是改革在前、开放在后,至少也是并列关系。但是如果从动力机制来安排其词序,应该说是开放、改革。开放是改变冷战时期半是出于被迫、半是由于教条主义的意识形态控制所导致的封闭状态,去迎接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与国际接轨”口号的流行,表现出拥抱全球化的热情,由此也形成了广泛的社会改革的动力。中国的改革没有走“休克”式的道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不仅是一种政治谋略的产物,在更深的结构层面,展现了中国作为一个东方大国的文化同一性。

在“全球化”成为关键词的同时,“本土化”以及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关系被一些好学深思的学者所关注。20世纪90年代以此为主题举行的一系列学术会议、出版的论著,不仅涉及到知识生产的问题,而且更深地折射出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如何开掘传统资源、展现民族文化的独特性那样的问题意识。中国的经济起飞及其种种社会后果,和后现代理论的传播,从实践和理论的角度,共同激发了现代性研究或现代性批判。换言之,与几乎全民族拥抱“现代化”相比,“全球化”在中国如果不是毁誉参半的话,至少也不是毫无质疑地被接受的;而“现代性”一词,在中国一开始简直是一个负面的价值。当然,思想的进程并未坠入单向的极端,围绕着

“现代性”所展开的是对现代现象的总体性反省,既然它关系到历史、现实和未来,就合乎情理地形成着一个范围更广、影响更为深远的争论,并且有希望因此产生重大的理论成果。

“现代化”、“全球化”和“现代性”作为汉语词在流行中时间的顺序,并非先后更替的关系,而毋宁说是思想在逐渐走向更高的综合的过程。如果说“现代化”曾经主要用于表征西欧北美以外的国家和地区追求现代发展的过程的话,“全球化”曾经被理解成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的同质化现象,而“现代性”则是对这一过程和现象的本质批判。现代化和全球化都处于现在进行时态之中,“现代性”成为关键词,表示对于中国人而言,“现代化”和“全球化”都有了更复杂的意蕴。换言之,现代性研究将现代化、全球化诸概念包含在自身。

几乎人所共知的现实是,“现代化”并非单一的西方化,因为“全球化”同时引发了“本土化”。与经验世界的联系,迫使“单一的现代性”让位于“多重现代性”的概念。而正是对多重现代性的肯定,成为中国学者研究“中国的现代性”之观念前提。十分明显,研究“中国的现代性”,不但包括了对中国的现代化的历史之反省和未来之规划,而且包括了在“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本土)化”。当全世界都被中国的崛起所震动——对于某些人或秩序说是“搅乱”——的时候,“中国的现代性”研究被期望有超出国界的意义。

二

近年来,作为“211 工程”的一个项目,华东师范大学的文史哲多个学科的学者合作展开了对于“中国的现代性与人文学术”的研究。这项计划的中心是研究“中国的现代性”和从现代性研究的视

野讨论人文学术的发展。现代性研究是人们对现代现象的理论反思。而“中国的现代性”这一概念的提出,一方面意味着中国学者的文化自觉,意味着中国学者对中国经验的认知提高到总体性的程度。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对中国现代现象的思考必须安放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因为正是全球化,对中国乃至世界历史进程发生着越来越深刻的影响,成为我们时代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如何看待全球化,如何以中国经验来影响全球化,可以说是中国的现代性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

像许多学术讨论的热点问题一样,围绕着“全球化”的本质、历史和走向等诸多问题,国际学术界充满着争论。有的历史学家认为,全球化早在500年以前就开始了最早的一波:西班牙开始了“世界体系”,随之开创了现代性。但这是一个失败的世界体系。替代它的是从荷兰开始的资本主义全球化,它是另一种欧洲中心主义的现代性^①。而杰弗里·耿(Geoffrey Gunn)曾经把16到18世纪称为“最初的全球化”(first globalization)。“它包括影响深远、多向度的经济、技术、文化与制度上的交换、影响与借鉴。”19世纪则呈现了今天研究全球化的主流范式,这一范式现在受到了严重质疑并正在发生转变^②。

① 恩里克·迪塞尔:《超越欧洲中心主义:世界体系与现代性的局限》,弗里德里克·杰姆逊编:《全球化的文化》,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9—14页。

② 马克·塞尔登(Mark Selden):《对中国研究及中国在世界之上地位的再思考——20世纪漫长岁月中的战争、革命和全球化》。在这篇文章中,他认为18世纪的东亚以中国为中心,包括朝贡贸易关系在内的国际体系,不仅与布劳德(Braudel)所说的地中海世界经济,同样有活力和富有;而且“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贸易体系提供了一个协调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框架,而它的等级划分则将战争的可能性降到最低。对于一个在国际法理性的掩饰之下饱受滥用武力之苦的世界来说,这是一个值得引起认真思考的模式”。见本书第111页。

从某种意义上说,早在 1848 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已经描写了欧洲现代性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关系。他们指出,资产阶级正在“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通过铸造统一的世界市场,“正像它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①。在资本主义批判的同时,马克思对世界市场和全球经济一体化带来的文化融合,有乐观的评估:

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有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②。

马克思用“文学”(Literatur)一词,表达的是具有世界统一性的科学、艺术、哲学之类的著作。因此,这里的“世界文学”,就是精神生产的全球化表现。这和历史学家对 19 世纪的描写是吻合的:大约从 1870 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世界经济的发展呈现出明显的一体化趋势。当时,商品、资本和劳动力的流动达到了创记录的水平,横跨大西洋的交通和电报也是前所未有的繁忙,人们经常愉快地谈论着“距离的消失”。

这种“距离的消失”,身处地球另一边的中国最敏感的思想家也觉察到了。不过它通常并不只是被“愉快地谈论”着,而常常使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71 年,第 28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71 年,第 27 页。

人产生强烈的精神张力。且不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震动曾左李等“同治中兴”诸名臣的心魄,即使对于维新运动的干将梁启超、唐才常,内心的焦虑也是显而易见的:

西人以动力横绝五洲也。通商传教、觅地布种,其粗迹也,其政学精进不已,駸駸乎突过升平也。无可惧也,无可骇也。乃天之日新地球之运,而生吾中国之动力也^①。

这可以看作中国人对 19 世纪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最早意识。如果他们在将这种现象归结为世界发展的客观趋势(所谓“天之日新地球之运”)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强调了中国社会对动力的追求的话;那么那个时代最有创造性的灵魂,已经由此而获得一种创造的灵感,去规划全球化的未来蓝图。维新运动的领袖康有为,在从事实际政治改革的同时,创作的《大同书》,描写了一个全球化的乌托邦:不仅“去国界合大地”,而且要“去级界平民族”和“去种界同人类”。“大同”固然要实现平等、自由、博爱等价值,但它同时也是一个单质的统一世界。

第一次世界大战曾经一度打乱了全球化的诗意图景。在中国也出现了反全球化或另类全球化的学说和实验。现代新儒家的先驱梁漱溟对以技术理性和商品经济为特征的全球化深恶痛绝,称机器是恶魔,整天算账的日子是非人的。但并未因此表现为犬儒主义;相反,他多次自豪地称,中国人从来气魄阔大,要说就是“天下”。古代汉语中的“天下”,其实是一个边界未定的人文世界,在 20 世纪中国人的意识中却就是这一个现实的“全世界”。这表示在修改全球化的规划方面,中国人应该当仁不让。因为,梁漱溟非

① 梁启超:《说动》,《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中华书局,1989年,第38页。

常坚决地相信,以技术理性和商品流通推动的现代世界,必将走向儒家文明和印度文明的在全世界的复兴。

中国现代化的历史伴随着民族主义的高涨,这个思潮曾经呈现过某种负面的作用,但是大体上正如论者所言,中国的民族主义并不注定是排外的,相反,其最初的动因主要是争取民族平等的国际环境,是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世界秩序的反叛和抗议。事实上,在民族主义兴起的同时,中国也不乏国际主义的信徒^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冷战的特殊条件下,中国曾经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来代替向苏联的“一边倒”和应对资本主义世界。著名的“第三世界”理论的提出,则进一步表达了被当时的两极对立格局所掩盖和牺牲的第三世界国家的生存和发展的愿望,实际上提供了一种新的全球主义的视域。毛泽东要将昆仑山裁为三截,“一截赠欧、一截遗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这种浪漫主义情怀,在今天的全球化现实中最多被看作另类的全球化规划,更多的是遭受了严厉的批评。但是并不抹杀它在思想史上的意义,最起码可以提醒人们注意到:从自称“天演化人”的康有为以来,最卓越、最有创造性的中国精英分子,始终保持着努力按照自己的人文理想来安排世界秩序的传统。

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以一度被压抑因而特别昂扬的热情正

^① 如徐国琪说:“此民族主义决非排他性的、狭隘的,而是建立在中国人民希望加入国际社会作为平等一员的强烈愿望之上的。用美国历史学家柯瑞佳(Rebecca E. Karl)的最新研究成果来表述,就是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的兴起,实乃中国密切参与国际社会的产物(“marked a Chinese intervention in the world”),是中国‘重新定位自己及世界’的结晶。换言之,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国际化的民族主义(internationalist nationalism),是建立在‘世界主义’之上的‘国家主义’,用近代政论家学者及政治家杨度的词汇就是‘世界的国家主义’。”(见《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二十一世纪》(香港),2005年8月号,第42页。)

面拥抱全球化的浪潮,中国努力争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成为一个最明显的标志。“与世界接轨”的口号在全国上下通行无阻,是它的心理表达,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和世界突然发现“中国崛起”,是它的一个历史性的结果。同时,由收入不平等、发展不平等导致的贫富差距、地区差距等全球性现象,在中国短时间内也发展到令人警觉的程度。提出“和谐社会”的目标,表明中国意识到需要认真应对这类危机。在韬光养晦的策略指导下,中国没有从正面强烈挑战全球化的现存秩序,但并不表示它准备永远全盘接受全球化的现有格局。人们从官方文件中可以发现不少是以发展中国家的代表身份对全球化的体制与规则提出建设性的批评^①,与毛泽东、周恩来的“第三世界”理论有着显而易见的内在连续性。

如果说官方文件阐述的是政治和国际政治角度的全球化观,那么当代新儒家和中国“新左派”的言说,凸现的也是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既接受又批评的复杂态度。第三代新儒家的代表杜维明说:

从观念上看,全球化并不是一个同质化的过程,至少对现在来说,那种认为非西方世界最终将因循一个单一发展模式的合流观念是过于简单化的……世界的彼此依存和相互依存从未达到今天这样的程度。然而,正在出现的地球村远未整合为统一整体,更不要说因循着一个铁板一块的单一模式。反之,它显现出鲜明的多样性特征,近来的发展日益倾向于维

^① 胡锦涛提出“进一步深化改革,使国际经济体制和规则更加公平合理,特别要充分反映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切,促进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的方向发展”。“尊重发展模式的多样性”,“建立公平、合理、有效的前年发展目标进展评估框架”。公平、合理、多样性等是最关键的词语。《《促进普遍发展 实现共同繁荣——在联合国成立 60 周年首脑会议发展筹资高级别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 2005 年 9 月 15 日)

护个体同一性。因此,当今世界成为这样一个竞技场,全球化和它的对立物——本土化——各擅胜场,正在同时对个体和群体产生巨大的压力^①。

根据这一客观趋势,他们主张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进行“文明对话”。

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新左派”——更恰当的称呼似乎应该是甘阳说的“自由左派”——学者则不同,他们不仅批评“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对‘全球化’抱持着儒家大同式的理想主义,这种有关大同的天下主义不过是一个世纪以来不断重复的‘走向世界’的现代性梦想罢了,我们还能从中辨认出一些‘儒教化的世界图景’的依稀面目”,而且拒绝像自称为自由主义者的另一批知识分子那样,无条件地接受西方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保守主义主宰全球资本主义的格局。因而对全球化提出质疑:

全球化过程并不能自明地解决我们所面临的各种社会问题。从现代世界的发展来看,生产和贸易过程的全球化并没有自发产生与之相适应的超越民族国家的政治-社会组织的新形式,也没有发展出能够适应亚洲和拉丁美洲等边缘地区兴起的政治、经济关系,更没有解决所谓的南北差异和不平等^②。

因而主张重视对中国经验的现代性反省,并且提出了“制度创新”的任务。

跳开那些具体的主张和论证,我们可以发现,尽管“新左派”与

① 杜维明:《全球化与多样性》,《全球化与文明对话》,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80页。

② 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公羊主编:《思潮:中国“新左派”及其影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39、41页。